

河北省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高阳织布业简史

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
政协高阳县委员会

编著

毛作忠藏书

请交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徐俊元

河北省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高阳织布业简史

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

政协高阳县委员会

编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前 言

解放前的高阳织布业，在近代中国手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虽几经沧桑，但一直经久不衰。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曾使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纺织工业受到冲击，而高阳布区的织布业却仍旧能够持续发展。这一事实当时曾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为了探讨其中奥秘，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和高阳县政协的同志，共同对高阳织布业的历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编成此书，意在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高阳布区何以能得到发展，对今天的乡镇企业也不无借鉴意义。

在调查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共高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政协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走访了当年的大商号、工厂的老掌柜、会计、伙计、织染工人70多人，他们提供了大量材料；同时还参考了吴知、朱尚英诸先生的早年著述，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苏秉奇先生、北京光华印染厂原厂长崔国瑾同志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

河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地方史研究室：陈美健、牛国祯、梁学诚；

河北省高阳县政协：刘书楷、程一民、张纪元。

1985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高阳织布区的形成.....	(1)
第二节 “七·七”事变前高阳布业的三次兴盛.....	(3)
第三节 高阳织布业兴盛的原因.....	(8)
第四节 日伪统治时期高阳布业的衰落.....	(10)
第二章 布匹的织造和织布乡村.....	(13)
第一节 乡村织布业的兴起和织机的演进.....	(13)
第二节 高阳布区的农村织户.....	(17)
第三节 原料的变迁和布匹的种类.....	(24)
第四节 城乡织布工厂.....	(29)
第五节 高阳布区的典型织布乡村.....	(36)
第三章 布线庄.....	(48)
第一节 布线庄的兴起.....	(48)
第二节 布线庄的类型和经营方式.....	(50)
第三节 布线庄的机构和人员待遇.....	(51)
第四节 布线庄业务活动情况.....	(54)
第五节 布线庄的金融活动.....	(58)
第六节 布线庄的人事管理.....	(63)
第七节 典型布线庄介绍.....	(65)
第四章 高阳织布业的印染业.....	(112)
第一节 手工染坊.....	(113)
第二节 染线厂.....	(115)
第三节 轧光厂.....	(118)
第四节 机器染色整理工厂.....	(119)
第五节 颜料店.....	(124)

第六节	色线市与色布市·····	(125)
第七节	印花业·····	(126)
第八节	高阳的主要染色整理工厂·····	(131)
第九节	解放前后高阳印染业的衰落和恢复···	(157)
第五章	高阳商会·····	(161)
第六章	高阳私立职业学校·····	(165)
第七章	高阳的其他行业·····	(167)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高阳织布区的形成

解放前，闻名全国的高阳布，其产地范围包括高阳、蠡县、安新、任邱等县份的大部，以及清苑、肃宁、河间的一部分。这个区域的面积，东西长约90里，南北宽约50里，包括500多个大小村庄，人口约50万人。因为高阳县城逐渐成为这个区域纱、布的集散中心，所以当时在这里所产之布，统称为高阳布。

高阳布产区位于河北平原的中部，境内及附近县份，地势平洼，河流交错。发源于太行山麓的潞龙河、土尾河和马家河，由西向东流经这个区域。河流所夹带的淤泥沉积，使河床加高，在夏雨季节，洪水猛涨，冲决堤防，形成水患。这里是有名的“十年九涝”重灾区。其中高阳县境内受灾程度最严重，受灾时间也最长。一年之中约有五六个月时间田中不能耕作。洪水过后，盐碱遍地，禾苗不长，庄稼无收，使本来就耕地不足的农民，生活难以维持，只好另谋副业以补生活之不足。当时除了烧瓦盆、制干粉、熬硝煮盐外，投入劳力最多、涉及面最广、收入最大的副业就数纺纱织布。这一副业，自明代后期在当地农民中便开始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家各户都是以木机织造窄面土布。直到清朝光绪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在高阳大力提倡织机改

革。留祥佐村人王士颖率先购进东洋铁机，招工织造，成为本县宽面土布织造的创始；其后，又有张兴汉（字造卿）、杨木森（字欣甫）、韩伟卿（字矩宸）、李秉熙（字馨斋）等人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为培养人才，他们建立商业夜校，后来发展为私立职业学校，专注重染织各科的学习；接着又成立“工业研究所”，加快了改良高阳布业的进程。这时恰逢天津实习工场购进日本织机，用日人为技师传习织布，商会便派人赴天津学习织布方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佐佐木、郡茂等洋行购买铁机，在高阳倡造织机，并由商家贷给乡间织布。由此，开创了高阳织布业的铁机时代，使高阳一跃而为高阳布区的领头者。据老年人回忆，洋纱铁机时代的兴盛时期，高阳县境内108村，平均一户一机，布机总数和产品数额占高阳织布区域的半数以上。高阳境内东面的李果庄、龙化、旧城，西面的板桥、西河、徐果庄、季朗村，南面的南北圈头、延福村、布里村，西南面的于留佐、赵官佐，北面的陶口、赵口、南马等村庄，农户均以织布为主，以农为副，不少发展为典型的织布村庄。

织机的改进，促进了布业交易的发展。商人布线庄兴起，很快垄断了原料的供应和布匹的生产（撒定机）和运销（设立外庄）大权。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交通的便利，在蠡县、清苑、任邱各县或设分号或直接销售棉纱，并同时收购布匹运回高阳，经过加工整理，贴上高阳商号的商标，运销外地。这样，高阳渐渐成为附近各布区原料散出和布匹销售中心。因而也就带动和促进了高阳布区各村织布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据民国17年（1928年）河北省政府统计：河北省127个县内有89个县织布工业相当发达，年产布2398万匹，而高

阳织布区的土布出产，即为549万匹，占河北省全省土布总额的近1/4，成为华北土布业之中心。

第二节 “七·七”事变前高阳

布业的三次兴盛

高阳布业自清末初兴起来，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30余年中，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变化过程。

高阳布业的初次兴盛，是在1915—1920年间。促成这次兴盛的原因有二：一是清末民初铁机洋纱的输入，打破了高阳布几百年来土线木机时代缓慢平稳发展的格局，即高阳布的生产、产品和销售跨进一个新阶段，其生产方式由原来的家庭副业性质跃升为地地道道的织布手工业，而且其发展速度很快，这为高阳织布业的兴盛奠定了相当的基础。二是由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洋货输入几乎断绝，各地宽而土布供不应求，这给高阳布业一个发展的机会。几年之内，高阳布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是撒机子制度得到推广和布线庄蓬勃兴起，布匹品种和产量迅速增长。新式铁轮机效率高，一台织机如正常操作，全年盈利不下200余吊，相当于农业雇工全年工资的10倍以上。大利所在，织布者风起云涌。兴盛时，高阳布区从事织布的人多达10数万名。那时织一匹布，可挣手工5角，织卖货的可赚一二元（现大洋，下同）。于是，人们挣了钱都想添置织机，扩大生产，有一家购置二、三架的，也有几家合买一架，昼夜轮班织作的。至1920年，高阳布区五个县的平面织机，已从1915年的5673台，增至21694台，几乎增加3倍。每年消

费棉纱10万包之多，产布约400万匹。

为在竞争中求发展，他们不断改良织造技术，更新产品。许多产品，视市场需要顺势而生。这个时期，除粗白布外，还增加了细白布、爱国布、电光布、褥面布、被面布、床单布、条子布、袍料以及线毯等，打破了高阳布业只能织白布的局面。

布线庄的兴起和“撒机子”的盛行，是高阳布业初次兴盛的最主要特征。它对高阳布业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早在光绪末年出现的布线商人，随着铁机洋纱的输入而逐步得到发展。织布业的急速发展，所需原料的来源和布匹的运销，织户已无暇顾及或无力承担。于是棉纱、布匹的经营已从杂货兼营中分离出来，专营布匹、棉纱的布线庄、布庄、布店、线庄应运而生。1920年，这类商号已由民国初年的3家猛增至60家。而最早、规模最大者首推庆丰义、蚨丰、汇昌、合记、元新等布线庄。为了适应布匹迅速增长的形势和获取更多的利润，各商号（主要是布线庄）纷纷派人到各地设立分号推销产品。这种分号，当地人称外庄。至1920年时，外庄分布在全国11个省34个市、县。

随着洋纱铁机输入而兴起的撒机制，在这一时期，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而且这一制度组织日臻完善。据当地老人回忆，这一时期的织布工人，80%以上为布线庄织手工（或称织茬子，与布线庄撒定机相对而言）。在远离高阳城的村庄，几达100%。织手工占了绝对优势。

高阳布业的初次兴盛时期，仅仅延续了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洋货又源源而来，尤其是日纱大量倾销，高阳白布遇到了国内纱厂大机器织的白布和山东潍县白布两大

劲敌，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经济衰退，高阳布市场缩小，销路锐减。

高阳布的第二次兴盛时期是在1926—1929年间。这个时期的到来，主要是由于国内经济情势的好转和人造丝浆经法传入高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激烈的竞争，高阳布业避开了竞争对手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创织了花样繁多的条格布和提花布。后来又引进了大提花机，1926年浆经法传入高阳，人造丝大量输入，提花机成倍增加，麻布织造盛行。提花麻布上市后，极受人们欢迎，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势。

在麻布畅销的同时，棉花的销路也很兴盛，出现了一个各类棉织白布、条格布、色布与提花麻布齐头并进的局面。为满足市场需要，各织布户、染轧厂、布线庄积极改进技术，研制新的品种。当时除传统的宽面粗白布外，棉布中又增添了细纱白布、色布和各类条格布。特别是提花麻布的品种，由于采用硬、软麻丝、棉纱的交织和经纬线支数的不同，组成葛、绸、缎、绉、罗纺等5大类上百个品种。使高阳布的品种数量达到了高阳布业史的鼎盛时代。

由于提花麻布的花纹图案清新，色彩鲜艳，加上质地细密，仿丝缎如真丝真缎，而且价格低廉，市场进一步扩大。高阳布的销售市场，开始向黄河以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域扩展，甚至伸延到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这一时期，高阳布线庄纷纷到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诸省的南阳、新乡、常德、湘潭、长沙、成都、重庆、汉口、沙市、昆明等城市设立新的外庄，大量推销麻布。高阳布的商标已遍及全国各地。

这一时期织卖货的织户显著增多。织麻布的织户，80%

是织卖货。他们自织自卖，一匹麻布可获利七八元之多，比织手工高两三倍。同时城乡织布小工厂也蓬勃发展起来。这种织布小工厂，按其经营方式划分，有家庭工厂和织布工厂之分；按地域划分则有城关织布工厂和乡村织布工厂之别。城关工厂有管家工厂、吴家工厂、南沙窝的许家益友工厂和当时规模最大的北沙窝苏家同和工厂等20多家；乡村织布工厂则主要集中在城东南乡的小王果庄、南圈头、赵官佐、于留佐等村。而在织造麻布集中的村庄十之七八是家庭工厂的经营。

第二次兴盛时期，仅有3年时间。到1930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的丧失，使高阳布业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1930—1937年，高阳布业的发展势头有所减慢，布机和布匹数量都有所减少，但并没有衰落。据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布业人员的回忆：“当时在高阳并没有觉察到织布业有什么变化。”一些有识之士曾分析说，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全球的纺织业，使各国的纱厂相继倒闭，产品贬值。中国大城市的纺织工厂也不能幸免。连经营最好的荣家字号也步步退却，渐趋衰落。恰在这同一时期，高阳土布业却承受住了亘古未有的冲击，得以持续沿革，甚至敢于和现代化的工厂相抗衡。这个奇观，引起了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及资源调查委员会的高度关注，毅然出资委托当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赴高阳进行实地调查。可以说1930—1933年期间，是高阳布业第三次兴盛的过渡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很短暂，不久就迎来了高阳布的第三次兴盛。

高阳布业第三次兴盛时期始于1934年，终止于1937年芦沟桥事变。当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市场萧条、产品滞销等不

利条件向高阳布业袭来时，高阳布业不仅承受住了这一压力，而且积极在布匹的质量和花样品种方面开拓新路，使高阳布业得以获得繁荣的转机。

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是：织机增加，企业兴旺。据历史资料记载，在1934—1937年间，不但以前所停布机都活动起来，并有增加。最典型的是同和工厂、鸿记工厂。据同和工厂的会计曹健全、同和驻天津外庄掌柜苏连堂以及苏家后人回忆，自1934年以来，同和越干越红火，扩建了北厂，新建了南厂，盖厂房百余间，添购提花机80多张。又增加了锅炉、染槽、精炼釜、轧光机、拉宽机、干燥机、丰田电动织布机等全套机器织染设备。还购买了大汽车一辆，买下了从北沙窝通向高阳城的地面，准备修通公路。此时，同和的从业人员增至400余人。鸿记工厂是由保定庆祥茂布线庄投资二三十万元在“七·七”事变前兴建的，有发动机、轧光机、喷布机、上浆机、干燥机、漂白机、染布机等，锅炉是全高阳最大的，还有40多张织机，撒定机1000多张。其他如正大、酉记、新彰、有为等厂也是在这个时期开设的。由于织染业的发达，布线庄经营欣欣向荣，大丰号在1934年以前还是一个银号，见布业厚利可图，于1935年将银号转为开设布线庄。

这一时期的整理业远远超过了前两次兴盛时期。由于条格布、提花麻布、色布的盛行，原来老式的小手工染坊已不能适应。机器染色整理工厂相继建立，而且争相扩大设备，研制新的染色技术。不仅县城大、小染整工厂增多（有机器染整工厂，有专营机器轧光的轧光厂，还有无数手工染坊），而且农村的染线厂、手工染坊也纷纷建立，多达30余家。

这一时期还盛行麻布印花。它既适应了麻布产品花样翻新的需要，也推动了高阳布业的发展。高阳的印花技术是李

恩波于1924年从上海传入高阳的。在1934—1937年间，经过张虫、刘仓、葛大龙等人的步步革新，使印花麻布不仅花纹图案齐全，色泽华丽，而且保持色彩牢固不褪。从而使印花厂发展到50余家。

这一时期，由于布匹销路很好，各地外庄纷纷函电高阳总号催货，有的甚至一天接到两次加急电报。布匹的畅销，使各布线庄在这一时期的经营，均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大丰号布线庄1935年仅开业一年，就获利24万元；其他布线庄获利也相当可观。当时不论是布线庄的经营者，还是织布户，面对布业的繁荣兴旺，个个心气极高，争着连续经营。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仅断送了高阳布业继续发展的锦绣前程，而且几乎濒临绝境。

第三节 高阳织布业兴盛的原因

纵观高阳织布业的发展，虽然也曾受到了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几经变幻，但终未一蹶不振，而且一直是华北乡村织布业的中心。“高阳布”名扬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它的地位。何以至此，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分散经营的优势。与城市织布工厂相较，在使用机纱原料、机器染整上大致相同，但在充分利用广大农村闲散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力量方面，却远非一般大工厂所能比拟。高阳织布区的500多个农村，就是一个庞大的工厂，所有农业劳力，甚至老幼均为织布工人。由于分散生产，生产工具简单，经营方式非常灵活，可根据市场需求，随时更新设备、改换产品。高阳布业就是以这种投资少、经营活、产品小批量、多品种的优势取胜的。

第二，注重培养人才。为了培养高阳布业的织造、印染和商业管理人才，高阳商会和各商号始终注意到智力投资这个重大问题。商会利用对商人的抽税（每经营1匹布交税金1文钱，参与线市交易的买卖双方，一年纳2元费用，轧光1匹布抽税半文至1文。税额不高，但因经营数额巨大，每年达数百万匹，故税金相当可观）和商家的自愿捐款，举办教育，培养人才。1909年成立了“商会工业研究所”，派出人员赴天津日商田村洋行学习织造，他们学成后回到高阳，对倡造新式织机，普及织造技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商会先后在高阳开办四所公立高小，一所初级师范和商业学校。以后改为“甲种商业学校”、“乙种农业学校”，并发展到1927年的职业学校，专设织、染专科，学习商业管理，为高阳布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懂商业管理和织染技术的专业人才。事实证明，这些毕业生大都成为高阳布业的骨干力量。

第三，精心经营，妥当管理企业。高阳的布线和较大的工厂，多以东家出资，聘请掌柜掌管经营。掌柜握有全部的财政和人事大权，并吃股份。这样经营好坏直接涉及本身利益，故一般掌柜在经营中都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工人也实行年终分红制，企业经营好坏也有切身关联。工人为保住饭碗，所以对掌柜总是服贴从事，一切照章办事，循规蹈矩。店铺上下和睦相处。

第四，产供销一条龙，以产促销，以销促产，也是高阳布业成功的重要原因。高阳商号在全国各地普设外庄，信息灵通，随时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原料，制定产品规格撒机收布。这样，经营起来不致耳目闭塞，坐井观天，而是以信息指挥生产，提调产品数量和品种，不至盲目生产盲目外运。

第五，吸收外资，讲究信用。商会为外地商人积极提供

方便，大力吸收外资，使他们在高阳设庄办厂有利可图。当时在高阳的外地商人主要有保定布线庄在高阳的分号和工厂，还有山西帮、南宫冀州帮、祁州帮商人。他们在高阳经营，除与高阳商人一样交纳低微的布捐外，无其他额外负担。所以在布业兴盛时不仅外地商人，也有不少来自安平、蠡县、饶阳和大名府的织布工人，在高阳乡村开设小工厂和充当织工雇工。他们对繁荣高阳布业也起了很大作用。

第四节 日伪统治时期

高阳布业的衰落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地处冀中平原的高阳县城被日军占领后，昔日繁盛的高阳布市场顿然萧条。在日伪统治的8年期间，高阳布业濒临灭亡的境地。

“七·七”事变后，高阳县城一片混乱，大商户蚨丰、大丰、合记、同和等纷纷逃往平、津、保等大城市。作为高阳布业生产流通机构的布线庄、布庄、布店、线庄，由于对外交通阻塞，棉纱颜料断绝来源，产品无法外运而停业倒闭，60多家无一幸存。14家机器染轧厂的机器，有的随东家运往天津，未能搬动的，均被日军抢走，加以毁坏，致使高阳染轧厂完全倒闭。只有几户杂货铺被迫维持营业，街面十分冷落。

农村织布户的命运更加悲惨。日军的频繁“扫荡”，烧杀抢掠，大批纺织机和织布用具被劫掠、毁坏，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加以1939年特大洪水，敌寇决堤放水助长水

患，冀中全区一片汪洋，乡村尽成泽国，庄稼被大水吞没，颗粒无收。敌祸天灾，乡村织户只得忍痛卖掉织机的铁件，把木机件劈柴烧火，携妻儿老小外出逃荒。高阳布区的织机从6万多张减至3千多张。每集上市棉布不到100匹，线不过三四百斤，麻布则完全绝迹。

日军对棉花、棉纱严格控制，大肆掠夺。冀中为河北产棉区，日军强迫凿井种棉。所产棉花，日伪组织实行统制收买。高阳、蠡县所产棉花，只准高阳之棉业组合及伪合作社收买。他们专门从事棉花收购，轧成皮棉，捆成包交售东棉洋行，充作军用。县伪合作社，则通过日用必需品的配合换取老百姓的棉花。日寇的罪恶行径致使乡村织户断了棉花来源。

东棉洋行隶属保定棉业组合，驻在原义丰布线庄大院。1944年以后改称“丸永洋行”。其内部设经理股、织布股、棉花股。正经理是日本人口清机、副经理房文端（天津人）。棉花股的任务是在高阳“收购”棉花，轧成皮棉外运；织布股则管撒机收布，以配给棉纱来控制棉布生产。

东棉洋行在高阳城内撒机收布，主要依靠伪新民会织业分会。凡要领纱织布者，必须携机住在城内，在支会长处申报登记，加入织业分会。支会长按登记名单领取棉纱。据1941年5月统计，在东棉控制下的织户有293户、517台织机，从业人数1271人。

由于高阳四乡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东棉洋行为了控制棉纱流向根据地，严格控制棉纱的分配，即按织业支会登记册的织机数分配。

由于战争，东棉洋行的棉纱也不能定量供给，且数量不多，所以回收布匹极少。从1941年5月至1942年4月的一年

之中，东棉撇机仅收回洋布38686匹。这些布匹回收后全部运往天津，进行染色整理，盖上天津商标出售。这样，高阳布产品在市场上就见不到了。